

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研究

方正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文化重心区的确认是区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而区域文化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从小区域中探究大历史，从乡邦文献中发现普遍性的历史问题，从而达到“从黄州看中国，从中国看黄州”。换言之，区域文化史研究不是地域文化史研究，两者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关注了普遍性的历史问题。本书以明代黄州府为考察对象，探讨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试图通过对个案的研究，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本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通览全书，可以看出其中有三点学术特色非常明显。

第一是问题意识。本书探究的主要问题是“明代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是如何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这里又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把府作为研究对象？其二，为什么把明代黄州府作为考察中心？其三，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文化背景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文化分区，我们一般以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来划分。形式文化区以某种文化的特征为标准，而机能文化区则以行政区划为基础。那么，我们在做区域文化研究时，到底选择何种标准来确定我们的文化区呢？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其形式文化区和机能文化区基本重合，因此，选择明清的府来作为区域文化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涉及明代黄州府在湖北文化史上的地位，湖北文化的发展有三大重镇、两大高峰。三大重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荆州，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明代的黄州府；两大高峰，一座是楚国八百年，以瑰丽奇特的楚文化为代表；第二是清末民国，鄂东（黄州府）人才井喷，出现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以明代的黄州府作为考察中心，可以说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可以改变湖北文化研究长期聚焦在荆州和楚文化上。第三个问题涉及区域文化的生成，这是区域文化研究的难点。



第二是证明的方法。本书主要采用了历史文献解读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历史文献是历史文化的载体，单纯从地方文献中研究地方文化，难免会得出片面甚至虚假的结论，而作者在田野调查中试图还原历史现场，用“在地”的观点解读历史文献，发现了“活的历史”。

第三是系统的研究。作者运用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研究人文重镇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试图在“内在理路”与“外缘影响”之间形成和合，探究人文重镇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中的各类要素的交互作用。

以上三点是其著作的精华，读过的人自能明了，在此不必赘言。当然，作为一本学术专著，尚有两点需要加强的地方，一是作为明代湖北文化中心的黄州与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如衣冠云集的南京、人文荟萃的杭州、王学嫡派的江西等地的文化互动广度不够；二是对明代黄州府内部文化差异探究的深度不够。因此，我们希望作者在充分挖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术实力，再接再厉，在区域文化史研究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刘礼堂

乙未年秋日于珞珈山人文科学馆

目 录

序 / 1

引言 / 1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 1

（一）主要问题 / 1

（二）现实意义 / 4

二、学术研究回顾 / 4

（一）有关区域文化史与民俗文化研究 / 4

（二）有关文化重心（中心）形成的原因研究 / 7

（三）有关明代黄州文化研究 / 8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与研究思路 / 10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10

（二）研究思路 / 13

第一章 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外部条件研究 / 15

一、湖广的发展大势已进入“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黄州府获得区位优势 / 15

（一）商代南土的政治军事中心：黄陂盘龙城 / 16

（二）全楚之中：荆州 / 18

（三）天下之腰膂：襄阳 / 22

（四）湖广行省的中心：武昌 / 25



- 二、“蕲黄合一”有利于鄂东地域的统一和内部交流，促进了鄂东社会的整体发展 / 28
- 三、汉口的兴盛，带动鄂东外销型农业的发展 / 32
- 四、移民与黄州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 34
 - (一) 三苗与鄂东 / 35
 - (二) 扬越、楚人与鄂东 / 37
 - (三)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的“五水蛮”与鄂东 / 43
 - (四) 宋元明时期江西湖民与鄂东 / 45
- 五、“湖广熟，天下足”与湖北及黄州府经济发展 / 53
- 本章小结 / 57

第二章 明代黄州府何以成为湖北的科举中心

——以麻城为考察对象 / 60

- 一、明代黄州科举兴盛概况 / 60
- 二、科举兴盛的文化生态——以明代麻城为考察中心 / 64
 - (一) 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以明代麻城为个案 / 64
 - (二) 明代麻城科举兴盛的文化生态 / 75
- 本章小结 / 100

第三章 明代黄州府何以成为学术的中心 / 101

- 一、李贽哲学产生的学术背景 / 101
- 二、黄州是王学的重镇，学术空气浓厚 / 108
- 三、个体的主观努力与学者文人的互动——李贽哲学形成的文化生态 / 112
 - (一) 李贽与耿定理——李贽来黄州之前的思想与归隐黄安的原因研究 / 113
 - (二) 在自由与独立之间——李贽哲学思想形成的经济考察 / 117
 - (三) 锋锐益盛，光芒愈炽——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过程 / 122

(四) 李贽与梅澹然——论李贽的启蒙主义的女性观	/ 134
本章小结	/ 138

第四章 明代黄州府诗文创繁荣及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研究 / 140

一、明代黄州府诗文创整体概述	/ 140
二、明代黄州府作家个案研究	/ 143
(一) 有真我然后有真诗——士大夫诗文研究	/ 143
(二) 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闺妇诗文研究	/ 148
(三) 民间自有真诗在——歌妓呼文如的情诗	/ 150
三、黄州楚风兴盛的原因探究	/ 152
(一) 文化积淀是黄州楚风兴盛的基础	/ 152
(二) 文人学者结社讲学之风促进了黄州楚风兴盛	/ 159
(三) 李贽的“识、才、胆”点燃了黄州人的文学创造之光	/ 163
本章小结	/ 166

第五章 明代黄州何以成为湖北医药学的中心 / 167

一、黄州：名医荟萃地 医药文明乡	/ 167
二、从医药中心到医药学中心——医圣李时珍、万全的杰出贡献	/ 171
(一) 北斗以南一人——李时珍的学术思想与科学成就	/ 171
(二) 儿科医学大家——万密斋	/ 179
三、黄州医药学中心形成的文化生态——以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为考察中心	/ 181
(一) “地齐”——黄州医药中心形成的地理环境	/ 181
(二) “政俗”——成就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社会历史条件	/ 194
本章小结	/ 241

结束语 / 243



参考文献 / 244

一、历史文献 / 244

(一) 官书、政书类 / 244

(二) 文集、笔记、杂录等类 / 245

(三) 史料、资料汇编类 / 247

(四) 方志类 / 248

二、今人著述 / 250

(一) 著作类 / 250

(二) 外国著作类 / 257

(三) 论文类 / 259

后 记 / 270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一）主要问题

本课题属于文化重心（中心）研究范畴。探究的主要问题是“明代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是如何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这里又涉及三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把府作为研究对象？其二，为什么把明代黄州府作为考察中心？其三，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涉及区域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周振鹤先生曾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疆域的广阔，不但存在战国秦、齐之间大范围的文化地域差异，以及省区与省区之间体现出来的明显有别的文化特征，即在同一省区内，也有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对这种差异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而不是发表大而化之的议论，是我国文化地理研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1]周先生此言主要是针对我国学术界在区域文化研究中以大文化区或以省区为地理视角的弊端。如 20 世纪 90 年代李勤德编写的《中国区域文化》把中国的文化区分为中原文化区系、南方文化区系、青藏文化区系、北方文化区系，每一个文化区系又再分文化区，如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等，这是概论性质，在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研究的深度上都存在不足。针对这种不足，以冯天瑜先生为总主编的、汇集全国地方文化研究名家编写的一套《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丛书在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成为一时之标杆，但这套丛书所呈现的仍然是大区域文化史的通论，虽然有几部著作是以省区为考察对象，如许怀林的《江西文化》

[1]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绪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 页。



等。区域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由传统的大文化区向省级文化区聚焦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学界研究学术理路的转换,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是,从现在还很不成熟的文化地理理论来看,一个行政区就是一个机能文化区,因为行政机能的作用,使得一个行政区有同一化的文化基础,而且有的省区已经出现机能文化与形式文化区重合的现象。二是,行政区有明确的边界,便于将研究限制在确定的范围内。”^[1]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司徒尚纪的《广东文化地理》、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张晓虹的《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刘影的《皇权旁的山西》和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浙江民间信仰研究》等。区域文化研究视角由大文化区向省区转换是学术研究的进步,但还不够,因为在清代以前,中国的省区变化仍然很大,而真正对文化影响较大的政区是统县一级,即州和府,其对其辖境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其中的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文化的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州或府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州(府)治不但是一州(府)的政治中心,而且一般也是该州(府)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2]以明清时代的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度的历史描写,实现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两个目标,一是探究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二是分析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把黄州府作为研究对象,是笔者主动适应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转向的一次尝试。这种学术转向也与西方史学界自 20 世纪 70 年代重视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地理视角相颉颃。在美国学者柯文(Pail Cohen)看来,“因为中国的区域性与地方性的变异幅度很大,要想对整体有一个轮廓更加分明、特点更加突出的了解——而不满足于平淡无味地反映各组成部分间的最小公分母——就必须标出这些变异的内容和程度。”^[3]

第二个问题涉及样本的选择问题。把明代黄州府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是由明代黄州府的文化在湖北乃至全国的地位所决定的。明代的湖北是继

[1] 李智君:《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与历史深度——文化地理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7 月第 007 版,第 2 页。

[2]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5 页。

[3] 转引自李智君:《文化研究的地理视角与历史深度——文化地理研究的范式转换与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年 7 月第 007 版,第 2 页。

先秦、两汉三国之后人文历史的又一高峰，故汉阳徐澄宇为《湖北诗征征诗启》云：“朱明代兴，文风大振。诗言四派，楚居其三。”^[1]明代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著作人数等各项指标均居湖北省第一位，尤其是明代黄州府弦歌不绝，一流大师云集，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风骚。黄州地域文化有一个兴起、发展、繁荣、消亡（再生）的过程，明代的黄州文化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繁荣期，具有生命的张力，清代虽然黄州文化仍然在湖北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已经僵化，而清末民国则是东西文化激荡，是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期。

第三个问题涉及文化重心（中心）形成的原因问题。“文化重心应指一个文化特别发达的区域，该区域的文化代表那一个时代的主要精神与中心内容，并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式的影响。同时这种文化或为统治者所提倡，或在当时名流文士中流行。”^[2]而文化发达区域是各种文化因素相作用而形成的，因而文化重心的形成决不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离不开当时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背景和条件，文化生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人类与其文化生态是双向同构关系，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3]文化学与生态学的交叉，形成了“文化生态学”。“借用‘生态’来表示文化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结构、秩序、状态等。也就是说，生态本来是一个反映自然、环境、状态的词，借用‘生态’一词来表示文化，形成文化生态的概念，目的是要表明文化现象也和自然现象一样，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有自身的内在结构、秩序和规律。”^[4]广东省社科联主席梁渭雄研究员、《学术研究》副主编叶金宝博士在《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文化生态学是研究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影响文化生存发展的一切因素，大体上包括外环境和内环境。外环境如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自然地理状况等；内环境是指文化范围内的各种不同文化，如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学派

[1] 王葆心：《再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

[2] 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页。

[3]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4] 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和不同地域文化等。”^[1] 决定文化生态的环境即条件有许多因素,最为关键的是“人的主体需要、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地域、文化政策、经济水平及科技教育程度等”。^[2]

(二) 现实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研究明代的黄州文化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美化黄冈,而是为破解当前困扰黄冈发展诸多问题提供历史借鉴。前面已经说过,湖北历史上的三大人文重镇,明代黄州居其一;湖北人才有两个高峰,一个是楚国八百年,一个是清末和民国时期。晚清到民国鄂东出现了一个“人才井喷”现象,鄂东近代产生了一系列大师级人物,如地质学家李四光,哲学家熊十力,政治史兼经济学家王亚南(黄冈人),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文艺理论家胡风(蕲春人),诗人闻一多,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浠水人),哲学家汤用彤(黄梅人),方志学家王葆心(罗田人)等,他们是湖北人,而且都是鄂东人,都堪称某一文化门类领风骚的一代巨子。这里所说的鄂东和现在的黄冈市和明代的黄州府在地域空间和行政区划上基本没有变化。明代的黄州府在经济上是湖北的上等州府,文化昌盛。反观现在的黄冈市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引以为傲的教育(主要指高考成绩)现在在湖北省也处于中下水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今天黄冈社会发展的滞后?这恐怕不是某个单一因素,而是综合症,所以在探讨明代黄州府人文鼎盛的原因时,笔者主要运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古为今用”,若要繁荣文化,必须优化文化生态环境。

二、学术研究回顾

(一) 有关区域文化史与民俗文化研究

该课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堪称古代该

[1] 梁渭雄、叶金宝:《文化生态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学术研究》第11期,第5页。

[2] 戢斗勇:《文化生态学——珠江三角洲现代化的文化生态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领域的标志性著作。进入 20 世纪,由于学贯中西一流大家的涉足,使区域文化史与民俗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占领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不少成果成为经典之作,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的沉寂之后,在新时期再次扬帆起航,成果迭出,具体而言经历了三个阶段:

1. 高起点的开创阶段

20 世纪上半叶,是该领域的开创期。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国粹学报》1905 年第 2 期)、梁启超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 卷 1 期,1924 年)、张耀翔的《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心理》4 卷 1 号,1926 年)、《中国人才产生地》(《晨报副刊》第 1480-1481 号,1926 年)、黄炎培的《清代各省人文统计之一斑》(《人文月刊》2 卷 6 期,1931 年)、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岭南学报》3 卷 3 期,1934 年)、潘光旦的《近代苏州的人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1 卷 1 期,1935 年);论著有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 1947 年);论集如吴越史地研究会编的《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江苏研究社 1937 年)等。

2.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相对沉寂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完全倒向苏联,并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人文地理学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1949 年后三十年间区域文化史与民俗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侯仁之对北京城的历史地理研究;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历史地理研究;谭其骧对历史政区研究,其标志性成果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最终构成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名作^[1]。

3.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期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2]。一是某种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涉及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等,卢云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

[1] 葛剑雄:《谭其骧:触摸祖国的山川河流》,《社会科学报》2011 年第 006 版,第 3 页。

[2] 葛剑雄、华林甫:《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155 页。



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张桂林《试论妈祖信仰的起源、传播及其特点》(《史学月刊》1991年第4期),张伟然《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王清廉等《中国佛寺地域分布与选址相地说》(《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吴成国《论东晋南朝婚姻礼制的地域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王日根《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两唐书列传人物籍贯地理分布》(《顾颉刚纪念学术论文集》),李泉《试论西汉高中级官吏籍贯分布》(《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王尚义《汉唐时期山西文人及地理分布及其文化之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王尚义、徐宏平《宋元明清时期山西人才的地理分布及文化发展特点》(《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肖华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3辑),胡阿祥《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周振鹤主撰《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叶忠海等《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曾大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三是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卫家雄《明清闽台风俗通义》(《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单树模等《论苏北古代文化地理》(《南京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徐建春《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刘岩《河北地域文化景观分析》(《人文地理》1996年第1期),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王本朝《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以战时北碚的文化生态为考察中心》(《红岩》2006年第1期)。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湖北人文重镇的鄂东相关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文化重心(中心)形成的背景考察重视不够。

（二）有关文化重心（中心）形成的原因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博士提出“早期中国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是在北纬 $31^{\circ} \sim 40^{\circ}$ 与东经 $113^{\circ} \sim 118^{\circ}$ 的范围之内,亦即山西、河南、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江苏与安徽北部所属范围”^[1]。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认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2]。施坚雅提出“区域性核心区(regional core)概念”,指出“中华帝国晚期的九大区域(大区, macroregion)中,除云贵高原外,其他区域的核心部分都位于河谷或低地地带,边缘地带则位于区域周边的高地、沼泽、盐碱滩和绵亘的山区”^[3]。丁文江博士是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探讨中国文明发祥地;冀朝鼎先生在吸收西方地缘政治的合理因子的基础上,从经济决定政治这一视角宏观把握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施坚雅侧重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核心区。总而言之,他们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核心区。

唐长孺先生认为汉末荆州文化中心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刘表统治荆州19年间,荆州聚集了大批来自四方的儒生学士。^[4]王本朝同样认为北碚文化空间的真正形成始于抗战时期,主要是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人。^[5]周振鹤认为东汉末年一些地区因接纳中原流亡人士,文化呈现出跳跃性的发展,出现了

[1] 丁文江:《格兰特教授的中国文化》,载《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第15卷,第2期,1931年7月,第268页。转引自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2]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页。

[3] G. William Skinner, Presidential Address: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 No.2. (Feb., 1985), pp.271-292.

[4] 唐长孺:《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荆州学派》,《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5] 王本朝:《文化空间的形成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以战时北碚的文化生态为考察中心》,《红岩》2006年第1期,第124页。



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繁荣。^[1]以上主要是从文化创造者的角度,即“人”的角度探讨文化重心(中心)形成的原因。

叶忠海等认为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是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沈登苗认为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原因有经济的发展、湘军的出现、地理位置和湘人性格以及学风传递。^[3]鲁西奇认为在不同层级的区域范围内,都会存在着受到不同层级的政权特别重视的地区,它集中了其统辖区域范围内最重要的财赋、武力、人才等资源,并拥有来自王朝所授予的治理其统辖区域的合法性(为军政中心所在);控制此种核心区,即足以控制其所得授权治理的全部区域。^[4]

从以上研究可知,文化重心(中心)的形成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也不是这些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多个因素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重心(中心)的形成离不开当时的文化生态,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来研究。

(三) 有关明代黄州文化研究

目前对黄州地域文化的研究在类型上主要是“黄州赤壁文化”“红色文化”“教育文化”等;在时间的节点上主要集中在宋代和近现代,而对明代的黄州文化研究比较薄弱,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综合性介绍,如史智鹏等主编的《黄州简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第五章《明朝时期》主要从地理沿革、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人名名流等几个方面来展开,是目前对明代黄州文化最全面的概述,但主要是介绍性质的,属于描写式,而没有论证,只是简单地把明代黄州府文化兴盛的原因概括为“楚风东渐”。这是不全面的,因为鄂东地处荆扬之间,有“吴头楚尾”之称,蕲春、黄梅、广济深受吴文化影响,吴文化浸

[1] 周振鹤主著:《东汉末年的士人流动与荆、幽、辽东、岭南短暂的文化繁荣》,《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2] 叶忠海等:《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华东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

[3] 沈登苗:《近代湖湘人才辈出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湖湘论坛》2000年第3期。

[4] 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染颇深。二是专题研究,如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蕲春名士顾景星的《李时珍传》^[1]和陈中文、许正清、韩进林等编写的《千古人杰李时珍》(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白战存的《李贽及其治学风格》(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王楚平的《中国名人之市探源—黄冈历代进士考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孙晓芬、李敏等的《麻城祖籍寻根谱牒姓氏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凌礼潮《麻城梅国桢大传》(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张建业主编《李贽与麻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凌礼潮、李敏主编《李贽与龙湖》(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林济的“黄州宗族与宗族生活”^[2],徐斌《明清鄂东宗族与地方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麻城孝感乡移民文化研究”^[3]等。三是初步从影响文化内外因素入手分析明代黄州府文化兴盛的原因,如张笃勤的《明清黄州文化科举兴盛及其社会根源》(《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3期),陈瑞生等的《论晚明进步哲学、文学中心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许苏民等:《李贽、耿氏兄弟和公安三袁》(《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罗福惠:《两舍则两从,两守则两病——耿定向与李贽“论道相左”新解》(《江汉论坛》2002年第10期),陈广宏的《万历文坛“楚风”之崛起及其背景》(《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朱丽霞的《齐气、楚风与吴习——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及清初诗坛走向》(《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等。

由此可见,先哲和时贤对明代黄州文化作了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值得继承和借鉴。总体来看,2000年以前,对明代黄州文化研究属于方志学研究范畴,重点在人物和艺文方面,其价值主要在资料汇编和乡帮文献的整理;2000年以后,研究的重点在明代黄州的教育和哲学,逐步进入文化的核心层,尤其是研究方法的革新,开始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张笃勤的《明清黄州文化科举兴盛及其社会根源》、陈瑞生的《论晚明进步哲学、文学中心在湖北》、陈广宏的《万历文坛“楚风”之崛起及其背景》这三篇文章虽然只是涉及明代黄州文化的一个侧面,但其研究方法对笔者的课题研

[1] (清)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八。

[2] 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1~401页。

[3] 凌礼潮主编:《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麻城孝感乡现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究有所裨益。

然而,先哲和时贤对明代黄州文化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从文化形成的背景和条件系统研究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表现为整体性不够,系统性不强;二是个案考察不深入,对明代鄂东文化特质把握不准,对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探究不深,尤其是对本地区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深度描写不够;三是研究方法不够先进,手段比较单一。

三、基本概念の界定与研究思路

(一) 基本概念の界定

下面就本课题所涉及的“明代”“鄂东”“人文重镇”“文化生态”“生态文化”等关键词作一基本界定。

明代 本研究所探讨的明代,主体是指从 1368 年至 1644 年,为了研究的需要,有时需要上溯到汉唐和宋元时期,下及清初。

鄂东 中国的行政区划以“山川形便”为主,辅之以“犬牙相入”。所谓“山川形便”是指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相一致。从中国历史上看,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稍小,而地名变化则很大,故戴震主张“以山川为主求其郡县”而反对“以郡国为主求其山川”,因为“历代史志建制沿革之纷错,无不就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1],目前学界对区域划分的标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来划分,另一种是以自然条件为依据来划分。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其理论核心是“地域即河川流域”。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理论提出划分

[1] (清)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483 页。